

China and UNESCO: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mpact on Member States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关系演进：

关于国际组织对会员国影响的
一项经验研究

谢喆平◎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China and UNESCO: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mpact on Member States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关系演进

关于国际组织对会员国影响的
一项经验研究

谢喆平◎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何 艺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曲凤玲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 关于国际组织
对会员国影响的一项经验研究/谢喆平著. —北京: 教育
科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041 - 5432 - 3

I. ①中… II. ①谢… III. ①中外关系 -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 研究 IV. ①D822 ②G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1859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1167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鑫华印前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3.75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6 千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因其在促进文化、教育和科学交流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世界人民心目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个地位崇高的知识机构，在中国学人心中，也是如此。我国一流的人文与自然科学学者常有机会参与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学术会议，这个组织的名字也就更紧密地和我国国内知识界联系在了一起。因此，研究这样一个国际组织以及该组织与中国的关系，是很多学人感兴趣的题目。但是长期以来并未见到有专门的研究，也鲜见相关的学术文章问世。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系演进的经验研究》的出版，填补了上述空白。本书的立意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演进进行历时分析。具体来说，本书从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身演变入手，结合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观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理念如何被中国接受并内化到中国的国家政策中，讨论中国如何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若干国际公约并积极参与公约的谈判，参与该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家软实力构建等问题。通过多个角度的分析，本书比较有说服力地阐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作为其成员国的中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变化过程。通过经验研究，本书得出了若干有建设性的结论，不但梳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理解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以及影响，提出了颇具价值的见解。更为难得的是，本书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收集了较为丰富的一手资料，并通过对政府官员、国际事务活动家、外交人员以及学者的访谈，较好地论证了自己的思考和分析。本书研究方法得当，论述充分，论点和结论正确。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本人并非教育学背景出身，但以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科训练来研究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系演进，可能更有新意，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而是在国家层面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起到了积极的知识传授以及促进文化、科学和教育交流的作用。通过与这样的国际组织机构打交道，改革开放的中国学会了怎样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宣传自己，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总结的同时，作者也就此提出了自己颇具建设性的意见。

我与本书作者谢喆平初识在十多年前，当时的她是一个初出茅庐好学热情的年轻人，积极承担了许多关于欧洲研究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我很欣慰这样的年轻人一直在求知的道路上前行，并愿意投身到相对寂寞冷清的研究事业中来。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一则为她研究成果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二则也希望此书的出版是作者本人学术生涯的一个新的开始，希望她在未来能有更多、更好的力作问世。最后，我祝愿作者以及她这一代青年学人，在学识与研究上不断取得进步。

石 坚

2010 年中秋于川大花园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文献综述	4
1.3 个案选择的依据	8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11
1.5 试图回答和验证的命题	12
1.6 本书的结构安排	14
第 2 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变迁：从理想主义到超越政治化 的现实理想主义	15
2.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本情况	15
2.2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7
2.3 功能主义与政治化：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途径	21
2.4 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	23
2.5 总干事的变化：从知识化走向政治化	31
2.6 超越政治化的回归：现实理想主义	35
第 3 章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进程的全面考察	38
3.1 进程分期：节点的作用	38
3.2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关系的发端：国民政府时期 (1946—1949)	40
3.3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48

3.4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关系的探索：体系内的旁观者 (1971—1978)	51
3.5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关系的发展：全面学习者 (1979—1998)	58
3.6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关系的深化：深度参与者 (1999—)	72
3.7	结语	84
第4章	学习者的具象化：对口机构和对口人员的设置与变化	86
4.1	对口机构的专门化与常态化	86
4.2	对口人员与业务知识的专业化	97
4.3	结语	109
第5章	学习进程之一：从理念到国家政策	111
5.1	个案选择与测度指标	112
5.2	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	113
5.3	全民教育	120
5.4	教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中的常用术语与概念	125
5.5	文化遗产保护：从后知后觉到迅速跟进	126
5.6	国家地质公园与世界地质公园：同步与超前	133
5.7	结语	138
第6章	学习进程之二：国际公约谈判和议程参与	140
6.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 多样性公约》谈判	140
6.2	《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谈判	144
6.3	对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参与	148
6.4	结语	151
第7章	未来指向的学习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软实力构建	153
7.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软实力	153
7.2	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与重返	157

7.3 法国与加拿大结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161
7.4 中国的软实力构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66
7.5 结语	171
第8章 结论和讨论	173
8.1 一般理论与中国案例	173
8.2 本项研究对既往研究的挑战与补充	175
8.3 对相关命题的回答	177
8.4 初步的结论	179
参考文献	186
附录1 访谈人物名单（以姓名拼音排序）	195
附录2 半结构性访谈提纲	197
附录3 访谈名录（以时间顺序排列）	198
附录4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	199
后记	208

第 1 章

导 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作用最为关键的政府间智力合作组织，同时，也是多种多样的非政府智力合作组织的网络节点所在。自中国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以及全球知识界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场所与主要平台。正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的教科文事业与整个世界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已经融入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全球共识在中国场景内的扩散与光大，也包括中国独特的改革实践和发展模式对全球教科文事业所提供的教益与启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日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因此日益紧密地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亦是中国与其他国际组织之关系、中国与由这些国际组织所建构的国际制度之关系的缩影和表征。因此，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其会员国中国之间的关系变化，对于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1.1 问题的提出

有关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始终是

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部分。^① 过去 10 年间，关于这三者的研究也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研究题域之一。在相关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假设前提。一是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国际组织被假设为相对静止的、主权国家进行互动的场所，其中，国家利益是主要考量，而不同的主权国家则互为变量。这一理论假设之于外交实践的影响，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过去若干年间中国关于“多边是重要外交舞台”的提法。与此相关联的第二个假设则是将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假设为相对被动的、由主权国家对之施加能动性建构或改造的对象。莉萨·马丁将 1980 年代中期在国际制度领域内的研究总结为“对制度起源、制度作用和功能、关于制度对国家行为及其后果产生的影响以及制度设计和原动力进行辩论”^②。从这一权威总结即可以看出，大多数的代表性研究重在研究国家对特定的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制度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将国际制度假设为受参与者影响的因变量，而将其最主要的制定者——国际组织视为外生性变量，仍然是相当普遍的倾向。具体的表征便是：较多的研究关注于国家行为的变化之于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影响，但对于国际组织自身的变化以及国际组织加之于具体国家的影响则很少关注。实际上，作为国际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绝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主权博弈场所，或是停滞的官僚机构^③。在主权国家入场进行互动和博弈的同时，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这些被既往研究所假设的恒量，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就此而论，本项研究将首先假定国际组织本身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这一变化的进程又是理解主权国家在其中发挥作用或充当特定角色的基本前提。

在以国际组织为自变量这一研究前提下，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演进在过去 30 年里逐渐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就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范畴而言，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子范畴，即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和中国与重要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多边外交关系。关于国与国之间双边关系的研究已经多且充分，虽然规范研究并不那么令人满意；相形之下，对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体系的关系问题，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远远

①② 马丁，西蒙斯。国际制度 [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3。

③ 薄燕。作为官僚机构的国际组织：评《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J]。外交评论，2008（6）。

不够充分。实际上,中国在其作为会员国的国际组织中的活动,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双边外交的范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较之于双边活动,多边更具国际性和国际化特征,“多边是舞台,双边是基础”即说明了多边活动高于双边活动的国际特征;作为自认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主张“有所作为”的和平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未来对相关国际组织的参与和卷入将会大大加深,而这一深化过程仍将会经历组织、人员和知识的整体性提升。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或者说国际社会的关系研究,如果说1998年尚有海外学者质疑中国是否已经真正进入国际社会^①,那么10年之后已经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这一事实。尤为重要的是,与国际组织的交往,对中国的国内制度乃至国家政策已经发生的影响,其深度甚至超过了单一的双边外交。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学者是以“从外观内”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的。自1950年代以来,在西方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研究视角:一种是早期将中国视为对既有国际秩序进行挑战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视角,另一种则是后来将中国视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视角,但主要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之经济主视角。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哪一种研究取向,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将中国视为“他者”(the other)^②。与西方的研究相对应,中国的研究起步很晚,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简单的资料介绍。进步到以“我们”(we)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也只是过去10年间才开始的历程。

但是很显然,与中西研究状况相对应的是,这个“他者”在过去数十年中的巨大变化和令人吃惊的经济增长,逐渐改变着上述几种视角所观察到的事实。那么,这一切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来说,在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中,自我形塑和被形塑的程度各有多深?其主要的路径又有哪些?这些形塑对中国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和国内转型发挥了什么作用?这种合群化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包括国内制度和政策的发展起什么作用?在这些单向思考之外,中国的参与对国际组织的

① Zhang Yongj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M]. Macmillan, 1998: 1.

② 同①: 2.

发展有无影响？影响的路径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也是本书所要追究的问题。

1.2 文献综述

总而言之，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既有研究，表现出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大多属于个案研究性质的学术努力，二是大多集中于政治和经济组织。以西方的研究为例，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哈罗德·杰克逊（Harold K. Jackson）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1990年出版的《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同盟》（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P,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①一书，分析的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侧重于中国参与这些国际组织的国内动力以及参与的经济行为。1998年张勇进出版的《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社会》（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②一书，分析的是1949年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金淳基（Samuel Kim）的一系列论文亦涉及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江忆恩（A. Iain Johnston）则从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满意率和参与率之间的关系来研究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他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社会化国家：国际机制中的中国1980—2000》（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③一书中。1999年伊丽莎白·埃克诺米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的《中国参与世界》^④一书，是对中国参与的几个重要国际组织的政策分析论文集合，此书可以说是1990年代西方关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研究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目前为止在中国引证率最高的该领域西方著作。

中国学者则是以“以内观外”的“我们”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研究，早期主要是对国

① Jackson H K, Oksenberg M.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P,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② Zhang Yongj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M]. Macmillan, 1998.

③ Johnston A I.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④ 埃克诺米，奥克森伯格. 中国参与世界 [C].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际社会的介绍，后来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政治关系分析，进而拓展到经济关系的分析。王逸舟主编的《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①一书从发表时间、研究内容和被引证的频率来说，可以视为与《中国参与世界》相对应的中国视角对照版。从两本书的对比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所谓“他者”和“我们”之间在立场、研究志趣、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见表1.1）。但是，在存在差异的同时，这两份研究亦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中国参与世界》本身就是美国对外关系协会资助的政策分析报告，在每一章后面都专门提出所谓“政策建议”或“预防措施”。《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虽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福特基金会联合资助的研究课题，但由于中国学者本身固有的使命感，政策分析功能被自觉地纳入该研究之中。

但是，这两本最重要的研究论文集的共同缺陷则在于缺少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入场式分析。由于很难得到机会参与国家对国际组织的实际工作，入场式分析和参与式观察的缺失无法避免。王逸舟在评论《中国参与世界》时曾明确指出，从事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需要掌握大量的有关中国与各个主要的国际组织的历史联系及现实关系的第一手资料”^②，但是，《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却也重复了西方学者所经历过的同样困境，即在其研究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对第一手资料的收集非常有限，甚至一本研究报告都没有使用，对从事相关国际组织工作的一线外交人员没有进行过任何访谈或其他接触。由于以上遗漏，这么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在原本可成为研究优势的分析深度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了不足。

① 王逸舟. 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 [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② 同①：3.

表 1.1 《中国参与世界》(英文版)^① 与《磨合中的建构：
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两书相关内容对比

	《中国参与世界》(英文版)	《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
出版时间	1999 年	2003 年
学界评论	国际上最早研究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专著，亦是影响最大的著作（王逸舟语）	中国第一本有关中国与主要国际组织复杂关系的著作
研究性质	美国对外关系协会资助的课题成果	社科院重大科研项目与福特基金会联合资助的课题成果
参与人员	美国多位中国问题专家（包括江忆恩）	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及国内其他机构研究人员、江忆恩
研究时限	1984—1999 年	1949—2002 年
分析方法	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
相关个案	联合国、军备控制、人权、贸易、金融、电信、能源、环保	核不扩散、维和、安理会、APEC、WTO、人权公约、气候变化、中国文化伦理定位
研究视角	观察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和中国的行为变化	中国的、历史的、决策的视角
研究特点	单向性研究；未讨论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无访谈或入场式观察	中国视角的单向性研究；无访谈或入场式观察

此外，由于中国近些年来在经济领域的巨大进步，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的经济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出现。从事一线工作的中国政府官员近年开始发表文章，比如财政部原国际司司长、现任副部长朱光耀的《世界银行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载《求是》，2005 年第 15 期），但是这样的文章仍非常少见。研究类著作则有胡鞍钢和王清容发表的《1981—2002 年间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载《当代经济科学》，2005 年第 10 期）等。因 2003 年非典之故，之后开始有若干论文关注专门性的国际组织，但较少见到分析中国与专门性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面

^① Economy E, Oksenberg M. China joins the world [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世。过去数年间,开始有论文关注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关系演进,并着眼于对中国的影响分析。例如:李志永的硕士论文《国际制度的国内尝试:以人权B公约和中国为例》(中国人民大学,2005),徐峰名为《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关系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05)的博士论文是对中国与世界银行全面关系的一次经济关系分析尝试,丁韶彬的《社会化视角下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关系》(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9期)提供了社会化分析的新视角,姜茜雅2009年的硕士论文《世界银行对中国国内制度的影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9)则尝试从建构主义角度对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但是,这几篇论文存在着相同的不足:第一,相关的国际组织均被假设为未发生或不发生变化;第二,第一手资料搜集上的缺乏,在姜颇有新意的论文中甚至连朱光耀的文章也未被引用;第三,作为经验研究论文,理论引述部分的幅度却远远超过经验研究部分。

值得指出的是,于宏源在最近几年对中国参与气候变化计划进行了追踪,其研究是迄今为止的研究中经验和实证部分最翔实的,主要有《国际制度对国内政策制定影响的三种分析模式》(载《开发研究》,2005年第3期)、《国际制度与政府决策转型》(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1期)^①、《国际制度和中国气候变化软能力建设:基于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08年第8期)、《中国和气候变化国际制度:认知和塑造》(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4期)。但是,他的研究基本囿于国际制度对国家对外政策决策层次的影响。

因此,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进行历史全程追踪分析的研究非常少,历史而全景的分析则少之又少,其中最主要的是前面提到的两本著作:张勇进的《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社会》(1998),江忆恩的《社会化国家:国际机制中的中国1980—2000》(2008)。这两本著作都是在西方出版的,尚未有中文译本。赵磊的《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九州出版社,2007)从行为角度分析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行为,但研究的基础局限于文本分析。张民选的《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局部地总结了教育类国际组织与中国的教育发展。以上诸种状况的产生有若干原因,而资料占有和入场观察机会两方面的缺乏应当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资料占有的缺乏原因之一

^① 但是在该论文中,于所指出的苏长和在理论方面的创新,应是科特爾和戴維斯的貢獻。

是中国对外决策和相关档案文件的不公开，相关调研报告的不公开，之二是研究人员对相关资料的搜集不谙其道。^①入场观察机会的缺乏则是由现行的外交制度所决定的。此外，在国际组织网站广泛普及之前，直接检索其文献资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对中国学者来说尚存在着这些障碍，那么，对中国之外的学者来说，类似的障碍更是难以逾越。可以说，中西方学者在这一研究上遇到了相同的困境。

如果说既有研究所累积实现的知识贡献构成了本书论说的理论基础，那么，其间所存在着的缺失和缺陷即成为本项研究力图加以弥补的重心和指向所在。

1.3 个案选择的依据

本研究选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主要分析个案。相对于其他硬约束性和高政治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特性使之成为考察中国与数量更加众多的、一般的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之关系的典型个案。本项研究之所以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演进作为案例，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考量。

首先，60余年来，作为国际机制的一部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身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仅见证了国际格局的变迁，其自身的发展也备受这些变迁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其联合国系统内最大的智力合作组织性质、组织性质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伦理化，使得它的变迁比其他组织的变迁更具有标本意义。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并且是联合国系统中一个重要的专门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专门机构，它既非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那样相对狭窄的专门化组织，亦非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的资金提供组织；按照它自己的话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本质上是一个“智力合作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思想的实验室”、“信息交流中心”、“国际准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能力培养者”和“国际

^① 比如，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早期交往文件资料长期存放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资料室，但是这一事实鲜为人知；笔者2009年方知道这批档案文件已被移往郊区仓库封存，无法调阅。此外，国家图书馆专设的国际组织阅览室亦鲜有人光顾。

合作促进者”，其业务范围涵盖了教育、科学、文化、传播四大领域。而这些“智力合作”，均属于非物质的国际结构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着宽广的业务领域，它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位的：教育领域的全球扫盲、全民教育、终身学习，文化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多样性城市联盟，科学领域的海洋事务、人与生物圈、国际地质公园等，这些计划与活动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与国际层面立体化展开，不仅丰富了国际社会的内容，更影响了会员国的国际社会化。从思想性、普遍性、选择性和物质偏好来说，相较于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业务领域高度专门化和高物质化（见图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识形态性、规则性和伦理性使之与会员国所发生的关系更具有普遍和持久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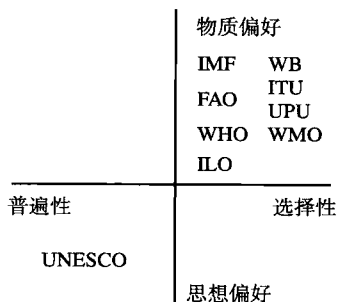


图 1.1 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的区位比较

注：机构缩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电信联盟/ITU，国际劳工组织/ILO，万国邮政联盟/UPU，世界气象组织/WMO。

其次，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是中国与重要国际组织关系演进的典型案例。“新中国”对于参加国际组织所设定的前提是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甚至不惜以退出为代价：“1958 年，由于国际足联将中国提出并已列入议程的驱蒋提案不经过充分讨论就否决掉了，周总理获悉后，指示‘立即退出国际足联’。1958 年，我国一共退出了 11 个国际组织，只留在四五个组织里。”^① 1971 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第一个在当年恢复，并且是主动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的联合国专门机构，而中国政府则是积极接受了这一恢复。与之对应的是，

^① 梁丽娟，何振梁：五环之路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